

新加坡华商之 文化资本的积累与转换

Cultural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ransfer of Singapore Chinese Businessperson



龙 坚 ◎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新加坡华商之 文化资本的积累与转换

Cultural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ransfer of Singapore Chinese Businessperson



龙 坚 ◎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加坡华商之文化资本的积累与转换/龙坚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615-4807-3

I. ①新… II. ①龙… III. ①华人-企业管理-企业文化-研究-新加坡
IV. ①F279.33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5543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xmupress.com

泉州新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960 1/16 印张:22.75 插页:2

字数:420 千字 印数:1~2 000 册

定价:5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序 一

文与商,原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文人与商人,在各自的领域里活动,追求不同的生活目标,呈现不同的行为模式。从中国的社会发展来看,学而优则仕是千千万万文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而商场的谋利行为向来受到鄙视,商人在四民(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里长期忝陪末席。社会上文者不商、商者无文的观念,极为普遍。直到中国人离开本土,在海外从事商业活动,积累了财富,建构了家园,掌握了华社的话语权,才逐渐颠覆旧有的社会阶序和思维。在新环境里,文与商的藩篱破除,出现诸如文人依附商人、商人出资办学以及儒商人物登场等新现象。

中国人在外经商,构成早期华人移民的重要类型。东南亚是华人移民最多的聚集处,也是华商施展拳脚的天地。该地区华商群体在形塑与发展的过程中,做出种种努力,以适应环境和探索机会,为自己寻找当下的立足点和前行的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巨轮的转动越来越急促,东南亚从漫长的殖民地时代转入独立建国时代不久,全球化时代已然降临,而伴随时代转化的是环境的变迁和各种新挑战的接踵而至。东南亚华商如何在时空交织的变动中求存与前进?他们借助、调动和创造了哪些资源?其得失成败又如何?都值得学者们探究。

龙坚选择了新加坡华商作为研究的对象。她从西方的学界得到了启发,领悟到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传统经济理论解释经济发展的不足,于是尝试运用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的资本理论,创设自己的华商研究架构。她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今新加坡华商的三大群体——即1920年代以后的老一辈华商,1980年代崛起的本土华商和1990年代出现的新移民华商为个案,从这些群体所处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特征、文化(传统与现代)的沿革和各种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配置,纵横交错地考察华商文化资本的积累及与其他类型资本的转换。她的研究,揭示了新加坡华商的文化资本特征,展现其资本积累与转换的合理路径,论述其与个体成功、企业发展、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

和关系。

龙坚从文化、文化资本和资本转换的逻辑和角度研究新加坡华商,视角新颖,成果甚丰。从东南亚的语境考察,布迪厄强调的文化资本以及文化、社会和经济三种资本的配置和转换,或许不能充分地解释各地华商的生存与发迹,然而却适用于新加坡华商的状况。印尼自建国后官商勾结的现象非常突出,华商与官场有权势者建立密切关系,获取政治资源,再将它转化为经济资源,不仅保全了事业,还得到极大的商业利益,展现政治资本之积累和转换的效用。但新加坡的国情不一样,特别是建国之后,华商的发展固然受到政府政策极大的影响,但若利用政治资本谋取经济最大利益,似乎是不可行。

从新加坡华商成败的角度来看,文化资本的积累与转换确实非常重要。即便追溯到龙坚研究的上限——1920 年代之前的境况,也不例外。例如,19 世纪末登场的儒商邱菽园,继承父亲可观的生意和财产,却以诗人和维新志士远近驰名,十年之内,生意失败,财产荡尽。他不仅没能或没意愿利用已拥有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还将经济资本转换为文化资本(从事文学、报业和文化活动)和政治资本(参与康有为的维新保皇活动)。作为商人,他一事无成,还掏空了原有的经济资本。同时期的林文庆医生,出身平凡家庭,却凭着自己的才华在商场上长袖善舞,并应用科学知识成为“树胶之父”(陈嘉庚的赞语),也造福了其他华商。他甚至以专业人士身份打破了 19 世纪纯商人垄断华社领导层的格局,因而为个人积累文化资本并将它转换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提供了最佳的案例。再看龙坚研究的 20 世纪的老华商群体,以树胶大王陈嘉庚和李光前为例,两人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而且具有冒险精神和创业气魄,但是论教育程度、语文能力、科技知识、管理哲学和子女教育等方面,李光前都远远超越陈嘉庚。从经济的角度检视,李光前在文化资本的积累和转换更为成功和持久。作为企业王国的创始人和继承者,他与他的后代更为出色。陈嘉庚绝对是出类拔萃的历史人物,但是作为商人,当他将经济资本不断转换为文化资本(在厦门和集美办教育)时,其企业王国便无法支撑,虽则他为时人后裔创造了更大的文化资本。

再从龙坚探讨的新加坡华商三大群体发展来看,文化资本之积累与转换的重要性愈发清晰,而且随着时间的进展越来越不容轻忽。老一辈华商生活在各种资本都欠缺的环境里,社会网络(如血缘组织、地缘组织和业缘

组织)的开拓相对重要,他们的成功就在善用和转化社会资本为其他资本。其中少数同时积累厚实的文化资本者则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李光前是也。至于20世纪末叶先后登场的本土华商和新移民华商,因为身处知识经济时代,比较不依赖传统的社会网络,但拥有老一辈华商相对欠缺的文化资本(即布迪厄所指的“制度化形态”,如文凭、证书等),掌握更多新的知识、信息、科技、理论和观念等,并善于将文化资本转换为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他们之中,出身贫寒、经济资源匮乏者大有人在,无不凭借个人文化资本的积累和转换而走向成功,新本土华商沈望傅(创新科技董事主席)是也,新移民华商蓝伟光(新达科技集团董事长)是也。

文化资本之于商人,其重要性毋庸置疑。龙坚这本新著《新加坡华商之文化资本的积累与转换》,就在这方面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细致的分析。这部作品,无论是理论的应用还是群体的划分,无论是文献的分析还是人物的采访,无论是实证还是推论,都很用心,也具说服力。龙坚的努力,为华商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并作了重要的补充,令人激赏。

李元瑾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2013年9月

序 二

龙坚博士推出这部论著,开启了一扇新视窗观照华商的行为与作为,指陈华商身处多元文化交叠折合的场域,无论背景与条件如何,每每必须调动各类资源才能跟体制互动,行使各种策略面对周遭并穿越界限,进而重塑各种结构和网络。

华商曾经是主要的华人移民类型。自秦汉开始,中国历届朝廷海航和海禁政策轮替实行,华商则从不间断地编织海上丝绸之路。纵横交错的华商网络连接亚洲沿海港口,继而贯通东南亚各处城镇,不但带动各地商品在不同地理疆域之间的川流,而且辅助各种文化元素在同一社会空间里面的交合。在这过程当中,华商不断调整步伐与身姿,其中介角色始终重要,欧洲殖民势力和土著之间都不得不借助华商来沟通,跨族群交流于焉发生。在早期的华人社会里,华商站在阶级上端而影响力波及各领域,其资金更是促进了会馆业行等社会组织,推动了报馆学校等文化产业,显示经济资本往往会配合需要转变为其他资源,从经济领域流向社会与文化等领域。

华商的主体性一直在重组着,因为语境在变易着。二战后,东南亚各地纷纷独立,以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运作,各种资源重新配置,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首要前提。随着华族身份从移民转换到国民,并且有的华人成为跨国分子(transnationals)和弹性公民(flexible citizens),华商的角色也产生新的变化,展示新的可能性。华人企业在继续跟其他族群商团互动的同时,也面对来自所在地国有企业的新挑战。中国自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后,华商代表各种国籍身份跟中国进行经贸往来,其资源的分布既是所处国的敏感议题、媒体的感性话题,也是学者专家必须敏锐观察的课题。这不是经济量化分析所能充分解释的表象,关注族群互动的文化研究反而能窥探华商的内涵,进入其内在逻辑。龙坚博士这部著作聚焦于新加坡,折

射二战后华商应对国内与跨国环境变动的策略,结合经济与文化的角度探究作为社会主体的华商。

龙坚博士对新加坡华商的研究,既有深入的人物采访,也有丰富的文献分析。在这基础上,她运用了法国学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资本论和场域论。布迪厄具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多种身份,主张人类个体与群体行为必须放置在多重结构和层面里进行研究。资本(capital)论方面,他认为存有经济资本(金钱、资产)、社会资本(地位、网络)、文化资本(教育、知识、习性、品味)三大类型,人类个体能够尝试按照所需对它们进行使用和配置,让它们互相转换以便各自的累积达到理想中的比例。然而,资本的使用与转换绝非个人所能完全决定的,而是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互动所导致的结果,即布迪厄所谓的场域(field)。布迪厄提醒,场域不断被结构化(structured)和在结构化着(structuring),个体与群体的习性(habitus)也因此处于成型与转型交替出现的过程当中。个体如何采用合适的策略应对场域的结构与重构,将会导致其资本、地位、处境是否会优化,或者衰退。

目前华商研究著作繁复,不少侧重本质化的论述,即集中于关系与网络如何体现族群性的同质化,关注多元文化语境中跨界线互动的相对不多。龙坚博士借用布迪厄理论揭开了新加坡的现实与脉络,显示新加坡场域是多重结构的,华商必须至少回应在地华族文化圈、西方英语文化圈、中国华语文化圈,处理它们或隔阂或冲突或融合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文化圈也在此消彼长,不断重组着新加坡的场域结构,影响着场域内行动者的习性,以及他们的权力与利益架构,因为个体的各类型资本也跟着产生变化。

为了呈现这种结构化着的场域,龙坚博士恰到好处地探讨了华商的三个重要群体:新加坡1920年至1965年崛起的华商、1980年代起家的新一代在地华商、1990年后出现的新移民华商。这三个华商群体的习性和策略各有不同。这部著作成功之处,在于剖析了三个群体如何处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如何在不同的文化圈累积这些资本,如何运用并转换它们。其研究发现饶富意义:每个群体致富途径不一,关键在于如何把握时机对各类资本进行配置并运转,以便达至最大的优化。这样的新认识,无疑破解了华商研究的固有迷思。原来华商并没有特殊之处,跟其他处于多元文化语境当中的商人一样,都必须穿越文化界线,并且连接。差

异仅仅在于是哪个场域、哪个体制、哪个行动者。而龙坚博士深刻地探究了新加坡场域里的华裔,对华人研究做出了贡献。

游俊豪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2013年9月

内 容 简 介

本书应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资本理论的研究框架,从场域与资本相互关联的研究视角来探讨新加坡华商之文化资本的动态积累与转换过程。

本书认为,在新加坡这个独特的社会场域中,华商必然要面对本土华族文化圈、本土多元文化圈,以及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的相互碰撞和相交相叠。本书主要针对三个群体进行探讨:第一大群体是1920—1965年代前后发展起来的老一辈华商;第二大群体是1980年代前后成长起来的新本土华商;第三大群体是1990年代后兴起的新移民华商。实践表明:老一辈华商在其所处的年代中,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即使层次偏低)以及身体化型态的文化资本的相对价值都处于较高位置;新一代本土华商和新移民华商在其所处的年代,他们所拥有的文化资本量的多少和质的高低是决定个人声誉、地位和权力的关键。另一方面,各类资本的功效则取决于个体所拥有的资本转换意愿和资本转换能力。

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ynamic accumul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of Singapore Chinese businesspersons in a framework of capital theory that was developed by Pierre Bourdieu. The study shows that in a unique social field such as Singapore, Chinese businesspersons have to face the overlaps and collisions of Chinese culture circle, multicultural circle and western culture. Thus, there are three main groups to focus on: firstly, senior Chinese businesspersons that set up their business during the period 1920—1965; secondly, new local Chinese businesspersons in the 1980s; thirdly, new immigrant Chinese businesspersons in the 1990s. This study shows that in the era of the senior Chinese businesspersons, social capital (though poor in quality) and embodied cultural capital are more valued; whereas in the era of the new local Chinese businesspersons and new immigrant Chinese businesspersons,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individual cultural capital is the key to individual fame, social status and pow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capital depend on the intention and capability of each individual to convert.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动机	1
第二节 海外华人的历史变迁和东南亚华商概述	12
第三节 研究对象及样本选取、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21
第四节 研究意义与内容架构	29
第二章 学术回顾及研究方法概述	33
第一节 关于海外华商文化研究的学术回顾	35
第二节 关于海外华商文化的研究方法概述	56
第三节 对经济增长和商业发展的理论解释	57
第三章 场域、习性与文化资本	
——一个动态的形成和积累过程	78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对华商文化资本的影响	80
第二节 社会主体文化与政府主导文化对华商文化资本的塑造	88
第三节 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	112
第四节 全球化的演进以及中国的崛起所产生的文化辐射	122
第五节 本章小结	127

第四章 社会资本嵌入的商业行为

——新加坡老一辈华商·····	132
第一节 资源的稀缺性与资源的有效利用	
——社会资本的建构·····	136
第二节 文化习性与老华商的文化资本特色·····	145
第三节 文化资本的提升与社会资本的扩张	
——资本转换的理性基础·····	163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80

第五章 比较优势与文化资本的积累和转换

——新加坡新本土华商·····	187
第一节 内在与外在的契合	
——比较优势的形成·····	191
第二节 文化资本的提升与管理模式的选择·····	204
第三节 诚信、创新与品牌	
——社会资本的建构·····	215
第四节 本章小结·····	236

第六章 “知本家”的资本积累和转换特色

——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移民华商·····	245
第一节 新移民华商的兴起和研究现状·····	245
第二节 知识、理念与内化	
——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	252
第三节 文化差异与文化适应	
——比较优势的建立·····	256
第四节 资本转换的东方特色	
——文化资本嵌入的社会资本·····	264
第五节 本章小结·····	285

第七章 结 论	292
第一节 社会结构、文化资本及资本配置特征	295
第二节 新加坡华商的文化资本转换途径	302
第三节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311
第四节 结 语	314
附录一 本研究中的受访者资料简介	317
附录二 本研究所涉及的案例个体简介	319
附录三 访谈提纲	320
参考文献	325
后 记	349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动机

一、选题背景

(一)文化的重要意义

所谓“文化(culture)”,不同学科其视角不同,定义也不尽相同,其中最为宽泛的一个描述是:“文化”意指人类心智方面的努力,包括人类社会全部的生活方式。但是,对这样一个表面看来似乎是众所周知、耳熟能详的概念,英国文化研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却认为,“文化是英文里最复杂的二、三个单词之一”;布罗夫斯基(Robert Borofsky)也指出:企图定义文化如同“把风关进屋子里”。可见“文化”的真正含义及其变动不定的本质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了解和描述的。^①

鉴于本书所涉及的“新加坡华商之文化资本的积累”与“文化”和“商业实践”高度相关,为凸显此关系,本书拟将综合采用以下定义:其一,是在人类学及社会学架构下经常用到的,即用来描述任何群体所共有的态度、信仰、风俗、习性、价值、理念以及规范等;其二,是英国学者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Bronislaw Kaspar)所提出的一个具有功能性特点的定义:文化是在特定环境

^① 相关内容可参见 David Throsby, *Economics and Cul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或大卫·索罗斯比著,张维伦等译:《文化经济学》(台北:典藏艺术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3月),第4~5页。

内,人类机体和群体为了基本需要的满足、为了把自己置于一个更好的位置上而充分适应环境所逐渐发展出的体系。^①这个定义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导向性,它标示出了作为社会场域中的主体——个体行动者构建文化的方式,也即,个体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和社会实践的活动中,不断外化、目标化自身的本质力量,去适应或利用或改造作为客体的自然环境、社会场域等,同时又不断地将所处场域中有益的信息内化为自身的本质。这个定义对本书将要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十分有益。至于第一个定义,正如索罗斯比指出的:“如果我们的目的在于探索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种文化阐释方式将特别有用。”^②

关于文化对社会繁荣、经济增长,以及商业发展和资本积累的影响,早在1940年代至1950年代,许多学者都曾高度关注,这是由于学者们认为文化是了解社会、分析和解释差异的重要因素。^③但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也许是由于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忙于脱离殖民统治,争取国家和民族独立,从颓废中站起来,重建家园,因此,这段时期,人们似乎一度忽视了对文化的关注。而到了1980年代,当东亚以及东南亚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正在突飞猛进时,非洲一些同样已经脱离了殖民统治的国家却仍然在落后经济的边缘徘徊;当人们面对西方发达的工业社会其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无论起落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时,人们又一次开始关注文化,试图从文化价值观和人性的角度来探讨如何实现“人的革新”、“文化的更新/再造”等课题,也试图以文化来解释这种经济增长与否和社会进步快慢的现象。

越来越多的学者、政治家与经济发展专家认为,对于社会这个大环境而言,文化价值观与态度,是造成进步或阻碍进步的因素。譬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基本上是植根于宗教的文化现象;班菲尔德(Edward Banfield)则指出南意大利的贫穷与独裁主义,有其文化上的根源,这些例子经常被引用。而对于企业这样的中环境而言,人是企业的微观主体,是企业最大的财富、资源和资本。人的观念和态度的确立、人的积极性和

① 庄锡昌:《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71页。

② 大卫·索罗斯比著,张维伦等译:《文化经济学》(台北:典藏艺术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3月),第6页。

③ 亨廷顿(S. Huntington):《文化有重要意义》(序),参见哈瑞森、亨廷顿编著,李振昌、林慈淑译:《为什么文化很重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12月),第1~5页。

创造性的发挥、人的知识和技能的提升等等是现代管理活动成功的保证,也是企业盈利增长和持续发展的保证。因此,一切管理活动均应以塑造企业良好的价值观、调动人的积极性、做好人的工作为根本,对物的管理要通过对人的管理以及对文化的追求来实现。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指出:“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观、传统与习俗的支配。”

在 21 世纪这个知识经济、信息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为适应高新技术的发展和需求结构的改变,挖掘人的潜力,发挥人的创造能力和智力,把人塑造成“有文化素质的能力人”便成为国家和企业提高生产力、加速经济增长的追求目标。与此相适应,东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势必要趋向于以“理性经济文化人”假设为基础和前提,才能解释推动经济增长和商业发展以及累积资本的因素究竟是什么。1999 年 4 月 23—25 日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Cambridge, Massachusetts, 又译麻省剑桥市)美国文理研究所召开的“文化价值与人类进步”研讨会上,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的政治学教授与计划主任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负责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认为,文化价值观与各国政治与经济的表现有很大的关系。^①

大卫·蓝迪斯(David Landes)在《新国富论》中虽然是以一个国家每个人平均财产及收入为基础来定义这个国家的成功与否,但他仍然承认文化对经济表现的重大影响力,并指出“若要我们从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里学到些什么,那就是,文化造就了所有的差异”。^②世界银行于 1999 年 10 月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个国际会议上也郑重指出“文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并强调“今后文化在形塑及决定银行的运作上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③波特(Michael Porter)则认为文化影响经济与竞争力,尽管他所指出的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交流将使得全球文化同质化这一观点还有待商榷,但他也强调

① 罗伦斯·哈瑞森:《为什么文化很重要》(前言),参见哈瑞森、亨廷顿编著,李振昌、林慈淑译:《为什么文化很重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12 月),第 7~29 页。

② David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New York: Norton, 1998), pp. 516.

③ 参见大卫·索罗斯比著,张维伦等译:《文化经济学》(台北:典藏艺术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3 月),第 9~10 页。